

第一章

汉学研究的发端

瑞典的汉学研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也可以说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这个传统就已经形成。虽然早期有关中国研究的资料并不十分丰富，但却可以在许多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收藏中发现端倪。瑞典人对中国文化的严肃的兴趣，从现在可以找到的史料看，当发端于 1655 年前后。这些史料当初主要来自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巴黎，如马蒂纽斯·马蒂尼《中国的海图》、阿善纳秀·西契《中国的长城》、约翰尼斯·梵·尼霍夫《东印度公司对清朝中华帝国的发现》、露依丝·雷·科米特《远航中国的记忆》等等。西契的作品显然是对一幅中国画的复制，充满了作者对东方的幻想。尼霍夫的作品描绘了广州港湾的风貌。这些欧洲画家的作品及其附属材料还揭示出，当时已经有一些中国画家为了适合西方买主的需要，开始自觉学习欧洲的绘画风格。据说这些绘画作品现藏于斯德哥尔

察 他们的成果大多陆续发表 对传播中国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 1731 年元月 14 日 注册文件表现出当时企业界人士的新观念 作为一个现代企业 公司的业务应当与商业政治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设定了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 坚持扩大对远东国家的贸易范围。公司的商务活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1731 年到 1746 年 持续了十五年。以后每隔二十年为一个阶段 即 1747 年到 1766 年 ;1767 年到 1786 年 ; 1787 年到 1806 年。公司对各阶段的商务活动分别作了经济分析，在这段时间里，公司的货船在哥德堡与广州之间共进行了 132 次商业航行。第一次商业远征开始于 1732 年 2 月 9 日 商船佛里德里克·雷克斯号在这一天离开哥德堡港湾，驶向波涛汹涌的大西洋 开始了她前往中国的处女航。考林·坎木贝尔 (Kalin Kambel) 先生装备了这条船 他以船长的身分开始了公司的营运业务。在启航之前 坎木贝尔先生被国王册封为贵族 并被指定为瑞典王国的特使去谒见中国皇帝。^①这艘船绕过好望角，横越印度洋，经过爪哇和苏门答腊 抵达广东 直到第二年 8 月 27 日才返回哥德堡。坎木贝尔成功地卖掉了所有带去的货物，并带回了满船的中国土特产 净赚了 9 万元银币。瑞典商人发现 中国的金、银、玉器、珍珠等工艺制品质量好 价格低于欧洲市场 纺织品、大米、酱油等土产品也都深受欧洲人欢迎。一位船长在其回忆录里记载了一些当时的进货情况：

1752 年元旦我们往船上装货 主要是瓷器、茶叶和丝绸。其中

① Tore Frångsmyr; Svenska Ostindiska Kompanierna.

Stockholm 1976.

茶叶 8 种 共重 11 030 642 磅 丝绸 7 种 共 961 匹 杂货 11 种 包括瓷器、漆器、珍珠等工艺品……

当第二次前往中国的航行结束时，公司的营业利润高达 50%。经济形势刺激了瑞典国内的商业经济活动 原来抱着观望态度的人也对公司的未来充满希望。其时 广州十三行的商会负责人潘启官 音译 为了表示对瑞典同行的尊重 特地长途跋涉访问哥德堡。在那里，他受到当地官员尼克拉斯·萨尔戈林 (Niclas Sahlgren) 的热情招待。他的朝服在当地居民中引起哄动 人们围着他争相观看这种色彩斑斓的异域服装。为此 他留下了一幅他自己身着朝服的画像 作为访问瑞典的纪念。这幅画像至今陈列在哥德堡博物馆。潘启官返回中国的时候 邀请了瑞典人迈克·格拉柏 (Michael Grabb) 去中国工作一年。

除了从事外贸活动以外，公司的商船还不止一次地携带瑞典科学家到中国考察。随船去中国考察的人大部分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林耐 (Carl Von Linné . 1707-1778) 的弟子。第一个去中国的植物学家是克里斯托夫·泰丝特娄姆 (Christopher Terström)，1746 年元月，他登上卡尔玛 (Kalmar) 船长的商船启航东行 目的是调查华南地区的植物生长状况。同年年底，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带着丰富的关于亚热带植被的信息返回了瑞典。第二个人是约翰·弗里德里克·达尔曼 (Johano Friderich Dalman) 他是植物学专业的实习生 随同公司最著名的“希望号”商船去中国实习。他用日记记录了每天的生活内容 回国后以书的形式发表出来。其他随船去华的植物学家包括古斯塔夫·弗里德里克·谢伯格

① Pehr Osbeck: A Voyage to China and the Indies.

Uppsala 1753.

(Gustaf Fredrick Hjortzberg) 皮尔·奥斯贝克 Pehr Osbeck) 和奥洛夫·梭伦 Olof Thorén) 等人, 他们后来都出版了日记或回忆录, 描述他们的航行和在中国进行植物分类调查的情形。

航海家们也常常为充满惊险的航程留下生动的记述。1746年, 航海家艾克伯格 Carl Gustaf Ekeberg 作为尤塔·醒狮号商船的二副初航广东, 1751年他成了弗里德里克·阿尔贝蒂娜号商船船长, 多次驾驶商船驶往华南。他告别航海生活以后, 发表了自己的日记《东印度之旅》。此后, 他又出版了《一位船长的航海生涯回忆》等著作, 描绘了他征服这条航线所经历的风险、沿途的风光以及广东沿海居民的生活状况。他对广东沿海地区男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描写尤其生动有趣。^① 1757年, 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对中国农业社会的简短描述》, 文章论述了中国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中国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如他们怎样制作酱油、如何借火炉取暖等等。他认为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是一个楷模, 中国人民勤劳刻苦, 善于通过生产实践创造财富。他希望瑞典人也能够采取这种方式发展农业生产, 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② 艾克伯格结束航海生涯之后, 回到乌普萨拉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 并与林耐结为好友。后来他荣任瑞典文学、历史、考古学院院长, 终身从事研究工作。1757年, 海上牧师皮尔·奥斯贝克 Pehr Osbeck) 出版了他的日记《1750-1752年的泛东印度洋之旅》, 这本书包含了丰富的关于

① Carl Gustaf Ekeberg: Ostindiska Resa-Åren 1771. Stockholm 1773.
A Short Account of the Chinese Husbandry.

② Carl Gustaf Ekeberg: "Kort Berättelse om den Chinesiska Landt-Hushållningen." Uppsala 1753.
See Ostindiska Resa Åren 1770-1771.
Stockholm 1773.

中国自然环境与民间文化的信息，主要是关于华南海岸地区植物研究与调查的记录，可以被看作是一本关于中国南方植物学研究的专著。^①与奥斯贝克一样，奥洛夫·梭伦也是一位优秀的植物学家。他首次远航广东是在 1748 年与 1749 年之间。他搜集了大量稀有植物标本，这些材料以及他在船上写的七封信，后来都送给了他的导师林耐。前四封信记录了船上的日常生活和船在风浪中历险的经过，后三封信则多是有关华南地区稀有植物情况的详细介绍。这些信件于 1752 年附在奥斯贝克的著作《1750—1752 年的泛东印度洋之旅》出版，是一份珍贵的史料。遗憾的是梭伦身体状况极差，他回到瑞典不久，便于 1753 年 8 月去世。他的导师林耐不止一次地抱怨，他失去了一个极有希望的学生，并且用梭伦的名子来给一门植物命名，以表示对学生的怀念。

在古斯塔夫三世时代，热衷于有关中国的话题，是一个普遍现象。约翰·阿伯拉罕·戈内尔 (Johan Abraham Grill) 1773 年曾在瑞典科学院作过关于中国自然科学史的专题学术报告，他特别强调经济繁荣对社会进步的作用。^②在科学院的文件里还可以发现皮特·约翰·布莱德 (Petter Johan Bladh) 关于中国手工业和水力资源的调查报告，这是一份了解中国清初工业状况的有价值的文件。

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瑞典人都十分欣赏中国人的农业管理和生活方式。汉斯·泰依 (Hans Teurløen) 从中国带回两本关于纺织

① Pehr Osbeck: A Voyage to China and the Indies 1750-1752. Uppsala 1753.

② Tore Frängsmyr: Svenska Ostindiska Kompanierna.

Stockholm 1976.

技术和如何种植桑树的书，他希望瑞典人可以迅速掌握这些生产技术。当时有一本流行的小册子以高度的热情赞扬中国的农业是优秀的范本。这本小册子不仅介绍了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还描画了理想化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态度，即在高尚的道德精神指导下通过勤勉的劳动来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

卡尔·佛里德里克·雪菲(Carl Fredrik Scheffer, 1715-1786)是十八世纪中叶汉学领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在 1743 年和 1752 年之间他曾担任过瑞典驻法公使与当时法国政府中的一批重农主义者关系很好他自己也有着重农主义思想非常欣赏中国人依靠发展农业来增强国力的政策。他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整个社会的力量重视以农立国才能普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最终达到建设一个理想的福利社会的目的。居留法国期间他还担任了瑞典王子的教师，他以上述思想来影响自己的学生，所以 1771 年以后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位的二十年中，重农主义思想在瑞典也很流行。1767 年雪菲帮助从前的学生墨西·德·莱·内韦勒(Mercier de la Riviere's Lordre)完成了三部重农主义教义并在瑞典全力以赴作这种宣传。法国人则把瑞典王子以及内韦勒的著作当做自己的保护神。^②由于雪菲对中国社会的管理方式有强烈的兴趣加上他的进步的经济思想他于 1773 年被任命为瑞典东印度公司总裁，这个职务为他实践自己的经济理论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雪菲不仅仅依靠讲演和授课来给上层社会人士施加影响而且写了一系列文章反复地宣传自己的理论主张如《关于外

① Tore Frångsmyr; Svenska Ostindiska Kompamerna. P. 138 Stockholm 1976.

② Eli. F. Heckscher; "Fysiokrarismen Ekonomiska Inflytande i Sverige."

Lychnos 1943.

来政治学必须包括贸易与财金知识的思考》(1757)《关于那个国家人口的思考》(1759)《从一个角度的讨论——致内克森·罗德先生的信》(1769-1770)《一个 Slavolaxbo 致他在斯德哥尔摩的爱国主义朋友的信》(1775) 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反复强调农业生产应当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健全的社会应当象一个大家庭,国王在这个大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他的统治必须遵循自然的法则。1772年10月28日在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出席的情况下,雪菲在科学院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宪法形态与民众幸福之间的关系》。这个演讲把中国描述成全部欧洲国家都应当以之为榜样的范本,认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懂得按照自然哲学的要求治理他的国家。在中国,不仅君主、而且平民也都普遍懂得自然哲学的意义,因此,这个国家的治理是成功的。这篇讲演集中体现了他的重农主义思想:

“目前世界上有哪些国家,她们的宪法是符合公众社会要求的?古老的中国早已显示出这样一种状况:一方面这个国家的哲学观与自然法则相吻合,因此国家重视和鼓励农耕活动,这项国策导至法律形态与人类精神趋于健全并且与公众的福利要求相和谐;另一方面,这种哲学观要求人人都与这个社会组织相适应并且自觉接受贤明君主的统治。中国,其社会制度仅仅适合于这样一种模式:统治者以其特殊的思想,在他所统治的土地上建立起父亲般崇高的威信、崇拜和荣誉,这方面的成功远远地高于其它国家的君主。^①

^① Osvald Sirén: "Kina och den Kinesiska Tanken I Sverige på 1700-talet." Lychnos 1948-1949

显然 古斯塔夫三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雪菲的劝告 在他继承王位以后 他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改革。他一直与那些法国重农主义者如康特·德·米拉比奥(Count. de Mirabeau)、康特·德·尼摩斯(Count de Nemours) 和巴底奥(Badeau)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认为中国人民生活在一种几千年亘古不变的制度下,这种制度促使中国变得政治稳定、人口众多和经济繁荣 因此 中国人民可获得一种真正的幸福。他希望重农主义的理想可以在瑞典土地上扎根。古斯塔夫三世在位时的许多政策、特别是自由化思想的盛行 都渗透了重农主义哲学的因素。^①或许 这些重农主义理论的传播、特别是来自十八世纪东方古国顺应自然思想法则的渗透,为今天瑞典成熟的现代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播下了种子。

在瑞典,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最早的专著于十七世纪末问世。1694年,乌普萨拉大学的尤纳斯·洛克纳斯(Jonas Locnaeus)以《中国的长城》为题 成功地通过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②文章长十四节,用拉丁文写成,作者在文章中对长城建筑构造的基本状况作了清楚的描述,认为它是世界上古代最宏伟的建筑物之一 是东方人高超的建筑艺术的成果。它绵延几千英里 穿越陕西、河北、蒙古、北京等省市 曾经成功地抵御了来自北方的敌人。三年之后,1697年,另一个学者艾略克·罗兰(Ericcus

① Ibid.

② Jonas Locnaeus;Murus Sinensis Brevi. Uppsala University,Sweden. 1694.

Roland) 在乌普萨拉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大中华帝国》。^①文章按流行的方式用拉丁文写成，作者描述了清朝初期封建帝国的基本社会状况，带有理想色彩地介绍了中国结构严密的社会管理制度，并且第一次把中国的行政区域与人口统计资料介绍给西方世界。他在文章中统计：中国的中央政府当时管辖山西、山东等 15 个省、包括 155 个城市与 1 312 个县 共有 11 287 819 户人家与 58 916 783 人口 这个统计资料来自于 1677 年清政府对全国人口的普查统计。值得注意的是 这项系统的人口统计活动甚至比瑞典第一次人口统计活动要早七十年。

当时 中国与瑞典两国之间远没有广泛的社会交往 因此除了少数以拉丁文直接写成的专著，瑞典学者的大部分论述中国文化的著作都是对西欧传教士的汉学著作的翻译或改写，或是对已经译成其它欧洲文字的中文典籍的间接译介。1687 年，一些欧洲传教士去当时江南富庶之乡杭州传教 把一些儒家著作如《论语》、《大学》、《中庸》、《礼记》译成拉丁文 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 (Philippus Couplet) 把这些著作译为拉丁文 写成一本书《中国的儒家哲学》(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带回巴黎出版。1710 年，乌普萨拉大学的东方学家奥拉瓦斯·谢尔秀斯 (Olavus Celsius) 在这个法国版本的基础上完成一篇论著《中国儒家哲学的学术批判》，^②他发现儒家学说与西方基督教颇有相通之处，在这些著作里可以找到类似诺亚方舟与摩西先知的痕迹。特别在社

① Ericcus Roland; De Mangno Imperio Sinarum.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1697.

② Olavus Celsius; Exercitium Academicum Confucium Sina Rum Philosophum
Leviter Adumbrans. Uppsala University 1710.

会理想方面，两种教义都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目的与追求真理的精神，能产生鼓舞人们向善的力量。1723年约翰·阿德·贝尔曼（Johan Arndt Bellman）用瑞典语翻译出版了一本儒家箴言，收孔子等人的语录八十条，是以法国传教士迈克·波陶德（Michael Boutauld）用拉丁文选译的儒家经典为基础翻译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人类道德完善和理想人格的讨论。^①这些早期的儒家经典是一种早熟的东方文化成果，凝聚了古代东方的先哲们观察社会、思考人生所做的努力。它们经由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传到瑞典，为瑞典知识分子勾勒了一幅含着脉脉温情的农耕社会理想国的图画，激发了他们努力解开东方文化之迷的热情。

自由思想与泛神论的哲学观首先是在英、法等国流行的，儒家哲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欧洲人认为儒家哲学含有深刻的自然宗教的思想，这甚至使有些思想家觉悟到人类的道德标准并不一定只有单纯依赖基督教才能建立。所有信徒都可以围在上帝的周围，人人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精神修养上存在某种相似的道德准则。1697年英国哲学家、物理学家莱伯尼兹在他的著作中高度赞扬孔子，并声称中国应当派自己的传教士，带着他们的自然宗教和哲学到欧洲传教。法国启蒙哲学家伏尔泰也说过与莱伯尼兹相似的话，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理性与完善精神的国家，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东方人智慧的结晶。这些哲学家关于中国的知识，都来自到过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莱伯尼兹所编的《中国近

^① 法文原名为：Les conseil de la Sagesse. 瑞典语译名为：Wishetens Råd, Det År: En Kort Summa af Salomons Regler och Läro-Språk-jemte Korta Betrachelser-Ur Frantzöskan i Svenska Tungomål et Wändas; Och med Confucii, den Chinesiske Philosophi, Sede-Lärors Förmerad.

事》(*Novissims Sinica*)收了法国、意大利诸国家的传教士南怀仁 (*Ferdinandus Verbiest*) 龙华民 (*Nicolaus Longobardi*) 张诚 (*Joan Franciscuus Gerbillon*) 等人所写的七篇记述中国情形的文字介绍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通过龙华民等人的转述莱伯尼兹了解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对先秦诸子的学说和宋明理学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他曾经用德文给雷蒙写过一封一万五千字的长信以《关于中国的自然神学》为题发表，1976年哈佛大学出版了这封信的英文版。他在信中对龙华民的《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和圣·德·玛利的《关于赴华传教的若干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说，并对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加以反驳。法国传教士白晋 (*Joach Bouvet*) 曾经被康熙皇帝聘为化学教师，他写信向莱伯尼兹介绍了中国的《易经》、礼俗及皇帝本人的情况。通过这种间接的了解，莱伯尼兹形成了一种在当时颇具代表性的对于中国的认识，他在给白晋的信中谈了二进位制与伏羲的八卦，认为伏羲是中国自然科学的创始人卦爻图是中国科学史的最早里程碑。他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写到毫无疑问中华帝国的文化已经超出其自身的价值而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他们享有东方最聪明的民族这一殊荣，其影响之大也就可见。他们对其他民族所起的典范作用表明自有耶苏使徒以来世界上大概还没有过比这更伟大的事业值得耶苏使徒去从事。

莱伯尼兹的瑞典学生奥尔夫 (*Wolff*) 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和基督徒他在这方面深受其先生的影响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哲学思想颇有研究，尤其赞赏儒家的自然宗教与教育思想。 1737年10

莱布尼兹著、庞景仁译：“论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总第4—6期。

月，他在隆德大教堂与主教卡尔·古斯塔夫·雪诺德（Karl Gustaf Schröder）辩论，强调儒家学说中的理性知识远远高于法国哲学。1758年，雅克布·娄定（Jacob Rödning）出版了他的专著《新中国史》，^①这是第一部以瑞典语写成的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概况为基本内容的著作。书的内容虽然不甚详细，大约依据中国清朝以前的史籍写成，勾勒出从传说中的黄帝、神农氏直到明代的整个历史发展脉络，向瑞典人展示出一幅他们从没有见过的悠久的人类文明史。1711年，基督徒恩维尔（Nver）把一些儒家学说的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和《孝经》译为瑞典语，另外一些比较深奥的古籍如《伏羲画八卦》与《易经》也被介绍到瑞典。还有一些拉丁文写的儒家著作在1667年就已经传入瑞典。这些典籍与古希腊、罗马的古籍一起，珍藏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当时乌普萨拉是瑞典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②

相对说来，瑞典传教士来华活动比较晚，不会早于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大约十九世初期，他们才开始向中国内陆发展。最早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是罗伯特·莫里松（Robert Morison），他冒险去了广东南部山区，在客家人当中开辟传教的新天地。当时广东人因为鸦片内销的问题对外国人非常反感，加上一些传教士因为传教和在当地人中间发展教徒而侵犯了非信教民众的利益，所以传教工作很有些危险性。罗伯特用两年时间开辟教区，发展了一批客

① Jacob Rödning: *Nya Historier om Chineserne, Japaoneserne, Indianerne & Persianerne.* Stockholm 1758.

② Tore Frångsmyr: *Svenska Ostindiska Kompanierma.* P. 154-158. Stockholm 1976.

家人教徒。嗣后，一批批瑞典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不同的省份开辟新教区，最多时一次就有六十多个热情的青年男女来华，献身传教事业。在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美国新瑞典移民区的美国瑞典基督公会自由传教会派出的使者。他们先后在广东、广西、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等十几个省份设立了传教基地。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传教士们常常遇到预想不到的麻烦，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如 1891 年的蒙古边境群众起义，曾经给传教士带来很大的麻烦。在苏平府（音译），一次就有十个传教士殉道。^①当然，从总体上看，耶苏会士来华传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活动的组成部分，但撇开传教士各种传教动机不论（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非本书论旨所在），客观上看，瑞典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瑞中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牧师艾略克·福尔基（Erik Folke）1882 年随约瑟夫·霍姆格伦（Josef Holmgren）来华传教，先后在河南、山西、内蒙古等地开辟教区，一直在中国工作到 1920 年。他根据中国人的心理特征，摸索出一套适合在中国内陆传教的方法，因此他开辟的教区发展很快。他还将《老子》、《庄子》等古代哲学著作译成瑞典语，带回国内出版。1922 年，他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书《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代表了当时瑞典一般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哲学了解的程度。^②瑞典传教士的另一个工作重心是建立学校，帮助当地居民的子女扫盲，以促进传教活动的开展。他们很灵活地与银行联合，以便取得财政上的保证。他们在很多地方办了路德学校，这些学校一般开办不长，大多为二、三年时

①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P. 515.

② Erik Folke, *Tankare i det Gamla Kina*.
Taibei 1966
Stockholm 1922.

间。1923年瑞典传教士在湖南益阳办了一所著名的信义大学招收新学堂毕业的青年学生。学校开设一般现代科学知识的课程如数学、生物、化学等。教员大部分是瑞典传教人员。学校开办了四年。到1927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骤变才结束。

在瑞典传教士中，把太平天国起义的情况及时介绍给西方世界，并在欧洲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的人是泰铎·汉伯格（Teodor Hamberg, 1819-1884）。汉伯格是一个商船船长的儿子，1819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市。他年轻时受过一些商业训练，然后当了图书管理员。他是个好歌手，热心参加社会活动。他周围的人有不少是教友，不断地给他以宗教的影响。有一次，他读了一本巴舍尔教士团的宣传小册子，很受感动，他响应小册子的号召，成了教徒。1844年到1846年，他被送进巴舍尔福音传教会受训。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先锋人物卡尔·古斯塔夫（Carl Gustaf）要求教会给他派两名助手，以便加强对中国教友联合会会员的教育和管理。汉伯格被选中了。遂于1846年3月被派往香港、广东参加传教活动。当时传教工作在中国是受到限制的，但他很快使自己适应了当地环境。他在穿着和生活方式上都中国化，力求与当地打成一片。汉伯格在客家人居住区工作，任务是扩大当地教友联合会的组织及其影响，并且开辟新教区。他还开办了一所儿童学校，建立了好几处传教士工作站。当古斯塔夫回国述职时，指定汉伯格代替他负责当地的传教工作。汉伯格对古斯塔夫的传教方式加以改革，开除了一些品行不端的教友，改组整顿了中国教友联合会。这件事导致他与古斯塔夫之间的矛盾激化。

汉伯格体质较差，曾几次从传教地区回香港养病。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洪仁玕在一次

战斗失败后 躲在灌木丛中四天四夜 昼伏夜行 于 1852 年 4 月逃到了香港。一个年轻教友把洪仁玕介绍给汉伯格 他们朝夕相处了半年 结为好友。洪仁玕在汉伯格的感化下接受了洗礼 成为基督徒。同时，他则从洪仁玕那儿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国太平天国起义、以及义军领袖个人的情况，这激发了他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深深同情。于是 他很快写出一本书《中国的起义领袖洪秀全以及广西农民起义的发端》 这本书于 1853 年在香港出版，1855 年在伦敦再版，及时地把中国近代一次最伟大的农民起义情况介绍给西方世界。汉伯格在书的序言中写道：

“虽然我不能说我曾与起义界 指太平天国起义 的任何人士接触 但我却成为一个曾与洪秀全的亲友交往过的人 因此能够搜集到关于洪秀全的可靠材料 了解起义的原因以及最初的情况。一个年轻人洪京（洪仁玕）去年 11 月在本地受洗，他是南京起义领袖的堂弟和密友，一个年轻的基督徒 1852 年 4 月把他带到这里来 使他免受满洲人的迫害。”

半年以后 洪仁玕乘船去上海 然后赴南京与堂兄会合 汉伯格送了他一些美元、世界地图、望远镜、温度表、指南针和很多书，包括《圣经》、《圣经史》以及其它历史书籍。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想沽名钓誉 只希望能及时向西方世界介绍太平天国的情况。他希望赢得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运动的尊重”，唤醒对中国千百万民众的永久的同情”。^①当汉伯格写完这本书时，太平天国起义已经取得了这场革命第一阶段的决定性胜利 并且奠都南京。汉伯格和他的朋友们都相信洪秀全即将成为国家的领袖，中国可能会成

^① Teodor Hamberg: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 Siu-tsu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 Preface. Hong Kong 1853.

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但历史的结果恰恰相反。不过 汉伯格并没有目睹起义的悲剧结局，他不幸得了非常严重的的痢疾，于 1854 年在香港病逝。

毫无疑问，汉伯格的著作在早期瑞典汉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作为西方人 第一次借助详实的资料描绘了中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的生平与革命经历 记述了洪秀全出生时的情形 介绍了洪家从宋代以来的家谱和家世变化，尤其详细记述了洪秀全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利用建立拜上帝会和传教的方式进行反清活动的过程 以及起义队伍奠都南京的情形。该书对起义的原因与过程描写细致 对起义首领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诸人之间维妙的关系以及三合会的聚分过程作了颇为客观的叙述 这在其它研究太平天国的著作中是不多见的。作者并不想作甚么解释 他的目的是陈述事实 记录那些经过可靠的途径搜集来的资料 当然 这些材料本身带有叙述者的倾向性 但本书作者的客观记录，或许可以烛照在那遥远的内地发生的带宗教色彩的政治运动。虽然该书对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以及清政权平息这场运动的过程涉及有限 对事件的叙述也略嫌琐碎 但他毕竟对广西农民起义领袖的日常生活与革命的初始过程这种不为一般历史家注意的内容作了详细而客观的记录，成为当时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也为今日的学者研究太平天国革命保留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十九世纪初叶 瑞典历史学家、瓦沙爵士安德斯·理铺司泰特 (Anders Ljungstedt, 1759-1835, 用英文写出了第一部澳门历史《葡萄牙人居住中国的历史素描 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以